書　評

家政與近代中國的形塑

連　玲　玲*

書　　名：Keeping the Nation's House: Domestic Management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作　　者：Helen M. Schneider
出版時地：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2011
頁　　數：xiv+321 頁

中國向有「治家學」的傳統，各式各樣的家訓及女誡均傳遞家庭道德與治家知識。然而正如家庭制度的論述在近代出現極大的變化，20 世紀以來的治家學也有新的內容。任教於維吉尼亞理工大學(Virginia Polytechnic Institute and State University)的舒海瀾(Helen Schneider)教授在《治國之家：家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政與近代中國的形塑》的新作中，不但討論近代治家學的內容，更把治家學的發展與國家建設聯繫在一起。過去關於近代（特別是五四以後）家庭問題的研究，多半把焦點放在家庭組織的存廢及家庭成員權力關係的重組等制度面上，諸如大家庭與小家庭之間的論辯、女性及兒女在家庭中的地位等，較少注意到「如何建立現代家庭」這類實際操作的問題。舒海瀾認為，近代治家學出現「國家化」與「職業化」兩個新趨向，這使得治家的主角－婦女－也有不同的角色認同。晚清以來，中國知識份子不斷鼓吹婦女必須認清自己對國家的責任與義務，不過許多議論僅止於概念性、甚或流於空泛口號的言辭；本書關於治家學的討論，正可視為婦女參與近代國家塑造的具體事例。

本書除了前言與結論外，共分為七章，前兩章綜述近代中國家政學的知識基礎，以及它與整體女子教育的關係。第三章起進入本書核心，作者花了三章的篇幅，描寫家政學在教育體制內的發展經過，包括教育目標、課程設計、實習訓練等。作者強調家政學的建立，不但是知識份子的「教化使命」，也是國家機器的動員途徑。然而這種帶有濃厚「資產階級」色彩、又深受「帝國主義」影響的家政學，無論從階級意識或政治路線的角度來看，均難以見容於中共政權，最後兩章即討論家政學在共產社會下的命運，以及家政學專家在毛澤東時代的出路。有趣的是，1980 年代改革開放之後，家政學又重回校園，甚至出現「家政商品化」的現象。藉著家政的概念與實踐，作者展現教育制度及國家政治的性別詮釋。

幸福，為了家更為了國

作者從「幸福家庭」的意識形態著手，說明發展家政學的社會條件。根據當時大量出版的報刊及生活手冊可以發現，「建立幸福家庭」是相關論述的共通點，而在這項工程中，婦女扮演關鍵性的角色，尤其是「主婦」。即便到了 20 世紀，知識份子討論家庭的重要性時，仍然引用《大學》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傳統經典名言；然而這並不代表「主婦」等同於「傳統婦女」。作者從各類報刊及家庭手冊歸納出現代主婦的角色，至少有四方面的任務。第一是操持家務，如育兒、清潔、烹飪等。表面上看，這與傳統婦女的家務勞動似乎沒有什麼不同，但主婦被要求以「現代」的心態與方法料理家務。例如清潔一項，不只要求主婦把居家打掃乾淨，更重要的標準是「衛生」── 維持身體、精神與環境的潔淨及健康，清除包括看得見的灰塵穢物和看不見的細菌污染。而烹飪也不只是把生的食物煮熟，要求注意營養成分，甚至包括卡路里的計算。在育兒方面，更要求主婦以科學方法照顧自己及孩童 ── 從懷孕之前，她就要在生理及心理上預備自己成為母親，生育之後又要在物質及精神上養育兒童；透過科學的家庭教育，培養正確的公民。第二是理性消費。和傳統的家訓、女誡一樣，民國時期的報刊要求婦女必須簡樸儉約，撙節用度以避免浪費，特別勸誡婦女愛用國貨，以杜絕漏卮。弔詭的是，儘管論者反對婦女在衣著、化妝品方面的「流行消費」，卻鼓勵婦女購買進口肥皂之類的時新產品，以維持個人衛生。作者並未直接闡釋這種消費

期望的不一致，但這其實是價值觀的問題：化妝品是增進婦女個人美觀的產品，而肥皂卻能帶來家庭及國家的衛生 ── 顯然後者才是「正確消費」的場域。

現代主婦的第三項任務是情緒管理，不但要正確地認識自己在家庭中的角色，也要進一步規範丈夫與兒女的情緒。受到新文化運動的影響，論者已不再使用「三從四德」作爲主婦行爲的標準，反而強調男女平等 ── 這並不是說男女有相同的角色和任務，而是他們同樣需要對家庭盡義務。正因爲幸福家庭有賴於家人關係的和諧，主婦的責任是創造一個安全的空間，讓丈夫及兒女的情緒得到正確的表達與抒解，家也就成爲寄託情感的場域。爲了提高家的舒適度，現代主婦的另一項任務是佈置家庭。1920 及 1930 年代，中國城市出現「室內設計」的風潮，許多家庭雜誌闢有專欄，指導讀者美化居家環境。這些雜誌的主編及作者認爲，家庭裝飾的重點不在於使用昂貴的高級傢俱，而在於品味的陳設佈置，所展現的是主婦的創意、審美觀及組織能力，目的是把家營造成一個舒適、愉悅的場所。由於這種高度的展示性，使得家不只是共享天倫的私密空間，而是接待賓客、聯絡交誼的社會空間。

從上述的現代主婦角色可以看出，傳統婦女與現代主婦的區別並不在於所從事的家務內容，而在於工作態度與方法 ── 科學、效率、合理、秩序、衛生是論者最常用來描述主婦的形容詞。更重要的是，主婦與國家的關係緊密相連，有了對的主婦正確地治家，才有對的公民正確地治國。要把主婦納入國家建設的工程，顯然學校教育是「製造主婦」最有系統且標準化的方式，而這正是國家努力發展家政學的基本

邏輯。因此作者在第一章探討主婦角色之後，隨即在第二章討論女子教育的論辯：究竟什麼樣的女子教育才能達成「建設幸福家庭以謀國家福利」的目標？而其中最核心的議題是，男女學生應該基於「平等」原則接受相同的教育？還是承認男女特質的差異而施予不同的教育？作者認爲，民國時期的教育理論家普遍接受「因材施教」的理念，主張男女特質不同，應根據其能力施予不同的教育。由於婦女具有「慈母之愛」的「本能」，被賦予照管家庭的「天職」，是最適合接受家政教育的對象；這使得家政教育成爲「女性學科」，也因此最早設立家政科目（系）的學校爲女子師範或女子大學。不過仍有論者對於男女差別教育感到不安，江學珠及劉蘅靜就認爲這會限制婦女的職業選擇，持續使女性處於從屬地位。即便如此，這些女教育家仍然承認女性負有大部分的家事責任，也不否認賢妻良母的必要性；劉王立明更主張家事技能是婦女尋求「獨立」的工具。這也進一步複雜化日後家政學的性質及發展目標。

作者從大量重複性的文本中整理出社會所期待的現代主婦特質，尤其是如何從這些看似常識性的言論梳理出時代意義，是值得肯定的努力。不過由於作者過於依賴所謂「幸福家庭論者」(happy family ideologist)的話語，使得論述極爲一致，均以國家社會的長治久安爲幸福家庭的前提或終極目標。然而當時的知識份子是否認爲幸福家庭只能爲了強國強種而存在，這個問題值得重新思考。最近游鑑明所出版的《運動場內外：近代華東地區的女子體育(1895-1937)》一書，對女子體育提出較爲細緻而複雜的看法，她認爲在晚清民國的國家民族危機之下，女子體育的目標固然是爲強國保種，但

這並不妨礙個人對強身健美的追求；國家與個人的目標時而一致，時而扞格，呈現出複雜的歷史圖像。這是研究近代國家與社會論述時，不應被忽視的面向。

從治家術到家政學

儘管家政教育的設計貌似複製「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場域及性別分工，它卻有相當程度的「現代意義」。作者首先指出近代中國的家政學具有多重的「國際化」色彩，除了一般所熟知的日本及美國模式之外，英國、歐陸、甚至菲律賓的家政觀念也被引介到中國，不過作者花較多篇幅討論日本及美國的影響。關於日本家政觀的討論，作者主要分析幾篇雜誌文章，說明日本基於國家需要而重視家政教育。不過事實上，日本家政教育對中國的影響遠超過學理的譯介。夏曉虹所研究的晚清女學校就有不少日本教員，搬演全套的日本女子教育制度；晚清民初留學日本的女學生，亦以學習家政爲多。因此可以說，中國最早的家政教育採取的是「日本模式」，可惜本書並未討論其中的內容。

美國方面，除了知識份子援引其家政理念之外，作者花費很大的力氣討論美國對中國家政教育體制所扮演的角色，這可以說是本書最具特色的部分。作者參考幾所招收中國留學生較多的大學（如奧勒岡州立大學、芝加哥大學）及美國傳教士在華設立的女子大學（如燕京大學、金陵女子大學、華南女子大學）的檔案，較清楚地勾勒出中國家政學的系譜。這些教會學校安排美國的家政學專家，來華協助設立家政系，培養專門人才。如燕京大學的美籍家政學教授 Ava Milam，推動美

國家政協會(American Home Economics Association)設置獎學金，幫助其它國家發展家政教育。1924 到 1949 年間，有 120 名中國女學生得此資助留學美國，學習家政；這些女留學生成爲民國時期家政教育的骨幹。像華西協和大學生物系畢業的彭榮華，先在多倫多大學修習家政學碩士，又在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取得食品營養學博士學位，返國後回到母校成立家政系。

此外，作者也介紹家政系的實習課程，特別是抗戰期間在農村設置的「家庭教育實驗區」。這不但令女大學生有機會把所學的家事技能應用在實際生活中，她們也藉機教育鄉民日本侵略中國的惡行。例如 1939 年金陵女大的社會教育工作包括識字訓練、公民教育、健康教育、生產教育、及抗戰教育等項目。由於抗日動員也是課程的一部分，受到教育部的歡迎與鼓勵，甚至提供經費給金陵女大繼續這項工作 ── 顯然教育官員相信，家政教育的實施可以從內部提升國家力量，繼而成功地對抗敵人（包括日本與共產黨）。不過除了這些既定的訓練目標之外，對這些女學生而言，這項鄉村教育工作還產生意外的結果：由於參與實習的學生都必須撰寫調查報告，這使某些學生得以利用這些一手資料進行更高深的研究，金陵女大社會系的熊亞拿在戰時參與鄉村服務站的工作長達四年，這個經驗使她得以進入康乃爾大學進修家政學。

透過大學家政系及家庭教育實驗區的設置，作者觀察到一個有趣的歷史轉變。從晚清到民國以來，鼓吹家政的知識份子乃希望可以訓練出能夠有效照顧家庭的主婦，不論是科學、效率或理性，都是用來應付家庭生活需要的質素。然而

高等院校家政系乃爲培養家政師資而設置，換言之，家政學不再只是主婦的治家技能，而是專門職業的知識內容，家政系也不是培養家庭主婦的地方，而是造就職業婦女的場域。

不過這裡可能需要把中學的家政教育和大學的家政專業訓練區別出來。在當時，不論是一般知識份子或是國民政府官員，大概很少人會把「訓練專業人才」當成家政教育的目標；畢竟能夠進入大學受高等家政教育的女子乃屬鳳毛麟角，中學裡做爲公民訓練一環的普通家政才是推行重點。即便是受過大學家政系訓練的畢業生，能夠進入職場服務者恐怕也是少數。其實作者掌握了不少大學家政系的資料，如果能夠以某些資料較豐富的學校爲例，統計出歷年家政系學生人數，及其畢業後出路，應該能更具體地描繪出近代中國高等家政教育的整體面貌。同時，如果要理解家政教育推行成效，除了官方檔案及校刊外，也應該參考學生對於家政課的看法及上課情形。如果對照當代臺灣的現象，在升學主義下，中學的家政課往往是數學、英文老師「借課」的對象，因此中學家政課形同虛設，徒具「整全教育」的象徵意義。這些現象是官方檔案所看不到的。本書對於家政教育的描繪，大部分還停留在理念層面，若能補充老師及學生的聲音，應有助於我們更深入了解家政教育的運作。

此外，本書所論述的美國影響，主要來自教會大學及家政專家，似乎是民間層次；但事實上，這些背後不乏美國政府的勢力。像美國透過農復會宣傳美國家庭觀念，以深化其文化影響。可以說，家政教育不僅是中國知識份子建構新國家的意識形態，也是美國擴大影響力的政治工具。

中共政權下的家政學

抗戰結束後，隨著復員，各校回到原來校區，也恢復正常的家政訓練；不過國共內戰的激化，以及戰爭情勢的逆轉，在中共的教育改革下，家政系也受到相當的衝擊。第六章討論 1940 年代後期至 1950 年代初期，家政教育如何從現代國家建設的一環，變成必須剷除的「封建遺毒」。作者指出，這個轉變首先是政治路線的反映：整個社會教育的計劃，尤其是社會家庭實驗區，相當程度上是國民黨的宣傳工作，因此中共上臺後首要任務是剷除這些「反動」文宣，以鞏固新政權的合法性。其次，家政學背後所蘊涵的是中產階級的價值觀，訓練婦女成爲經營家庭的主婦，這與共產黨以勞動工人爲婦女模範的「無產階級」意識形態背道而馳。再次，由於家政教育深受美國影響，這也被認爲是「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不但接管改造所有教會大學，也關閉其它院校的家政系。然而原有的家政人才並沒有因此消失於職場，而是轉往其它職涯，其中以教師（如化學系、心理系、教育系等）、兒童福利行政單位、營養師三項職業最多。

正如同許多在毛澤東時代被廢止、改革開放後又恢復的制度，1980 年代以後，家政學重返校園，成爲社會系「婚姻與家庭」的課程內容之一，而這也和民國時期一樣，是知識份子爲了回應當前的婚姻與家庭問題所提出的對策；1990 年代中期，大學恢復家政系的設立，主要歸功於過去這批受過家政專業訓練、深信家政教育對國家社會極爲重要的知識女性。除了知識份子的積極鼓吹，國家人口政策對於家政教育

的復興，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一胎化政策下，使父母更亟於獲取正確的育兒知識，市面上家政相關書籍雜誌的出版如雨後春筍般蓬勃，進而導致家政教育的「大眾化」。另一個有趣的現象則是林立於城市街頭的「家政服務中心」，提供介紹保姆、病房護理、照顧老人、接送小孩、家電維修、房屋租賃、空調移機、複印證件等各項付費服務，儼然將家政「商品化」，以解決城市家庭的需求。由於提供家政服務者多半是外來的勞動婦女（即農民工），她們離鄉背井到城市打工，滿足中產階級對「幸福家庭」的要求，卻疏於照顧自己的家庭；商品化的運作下，這個「幸福家庭帶來富強國家」的家政想像，反而加深階級界線，擴大階級差異。

中共政權下家政教育的變化軌跡的確是個有趣的故事，特別是「家政商品化」的現象，可以視爲改革開放後中國社會的縮影；可惜作者只將這個片段作爲近代家政教育的後跋，輕輕帶過。事實上，這幫助我們重新反省早期家政教育提倡者的階級意識，以及他們對現代國家的想像。相較家政教育在中國大陸所呈現的歷史斷裂，撤臺後國民政府所實施的家政教育卻是歷史的延續：不論政權或家庭意識形態，都是民國時期的遺緒。因此「後民國時期」的家政教育發展，也應該包括臺灣的故事。

整體而言，本書藉著家政教育的個案，勾勒出近代中國的性別圖像。從婦女史而言，它討論「主婦」這個新的女性範疇。從教育史而言，由於家政教育以女性爲對象，因此被視爲女子教育的一環；而家政系的設立，更爲我們提供性別化的知識建構及學科建立的具體案例。同時，本書追溯家政教育的長時段發展，特別針對戰時家庭教育實驗區討論家政

教育的實際運作，也有助於我們重新思考戰爭作爲歷史分期的適切性：對家政教育發展而言，中共政權初期的教育改革比迫使許多學校大遷徙的八年抗戰更具破壞性。從這些面向來看，本書的確爲民國時期的中國婦女史開啓更多研究的可能性。